

YETAN WENJI
● RUXUE YU JINGJI

叶坦文集

● 儒学与经济

广西人民出版社

叶坦文集

——儒学与经济

叶 坦 著

广西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 / 叶坦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19-05323-1

I. 叶... II. 叶... III. ①叶坦—文集②儒家—关系—经济—中国—古代—文集 IV. F12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7725 号

责任编辑 江 淳

责任校对 陈红燕 马妮璐

叶坦文集
——儒学与经济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网址 <http://www.gxpph.cn>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6

字数 460 千字

版次 2005 年 5 月 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219-05323-1/F · 619

定价 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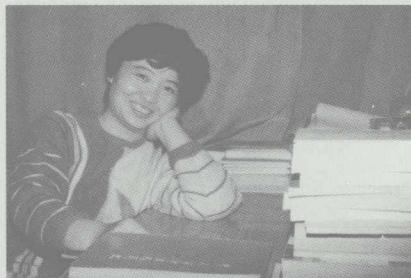
叶坦，女，1956年生于北京。历史学学士(1982年)、文学硕士(1985年)、经济学博士(1988年)。1971年参加工作，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88年起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起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先后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国际交流基金研究员、早稻田大学等校外国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学术委员；《中国地方志》、《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论坛》等刊编委，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等。

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开拓宋代经济思想史及中国经济学术史、经济范畴史以及东亚经济思想研究，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以及传统汉学和中国经济史学的创新，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1989年以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科院及国际协议等科研项目《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儒教文化圈”现代化发展的经济文化史考察》、《传统经济文化与现代管理》、《传统经济思想与东亚现代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新方法之探究》等；近期主持课题有《中国经济学术史》(国家社科基金)、《中国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研究》(国家人事部“留学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范畴史》(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重点项目)、《石门心学与清初实学经济思想比较研究》(The Sumitomo Foundation)、《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考》(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等。

已出版著作：《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主编，人民出版社，1992)、《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合作，Routledge Press, U.K., 1997)、《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日本の经济思想世界》(合作，日本经济评论社，2004)等16部；译著(均为主译兼校审)10余部；发表论文约130篇。

《传统经济观大论争》获中国社科院“首届青年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1992年)，《富国富民论》获中国社科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奖”专著一等奖(1995年)、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首届全国优秀成果奖”专著一等奖(1995年)等5项奖励，《宋辽夏金元文化志》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1999年)，《“中国经济学”寻根》获第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1999年)。此外还获得一些荣誉，入选《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Who's Who in Social Sciences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等。



序

岸本美绪

畏友叶坦先生的论文集即将付梓，她问序于我，这是很荣幸的事情。据我的了解，序言是一种介绍（信），即熟悉作者的导师或者前辈学者给广大读者介绍作者的为人和学问，这就是序言。我并不是作者的前辈，只不过是一个外国朋友，却给中国读者介绍已经很有名气的叶坦先生，这是不是太冒昧？心里感到不安。但她新书的出版，在我来说也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所以在此不揣冒昧作此小文，权表祝贺之忱。

叶坦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中国学者之一。虽然我的年岁比她大一点，可是我一直感觉她是我的学姐，这不仅仅因为她的研究水平极高，而且由于她对学问的热情和气魄实在值得钦佩。十多年前我在东京第一次和她见面交谈，便有一如故人之感。从此以后，每次在北京或者东京见面都促膝谈心，度过非常愉快的时光。她的好学、勤奋和对人生的诚实态度，给我在内的许多日本学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本书是集叶坦先生十多年来发表的论文之大成。除了《传统经济观大论争》（1990年）、《富国富民论》（1991年）、《大变法》（1996年）等已经作为专著出版的不收入以外，登载于学术杂志的重要论文几乎都已被收录。关于她的研究道路，她已经在本书收录的由其指导的《“不惑”人生》中自己介绍过，所以这里不详述

了。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贡献是国内外学界所公认的，我特别佩服的是，她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积极开辟新领域的勇气。我认为她研究的创新性有几个方面——

第一是把经济和文化结合起来作研究的方法。我认为这可说是她开始研究以来一贯的特色。我第一次拜读叶坦先生的著作是她的博士论文《富国富民论》，这本书不是过去常见的列举大思想家的“学案式”研究，而是把宋代社会、经济和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分析的十分新颖的著作。在这里所谓的“经济思想”与其说是有关土地制度、商品生产、货币等狭义的“经济思想”，不如说是当时人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全体性思考框架，她把宋代的新法旧法论争放在这种传统经济观思考框架中加以剖析，给读者极其丰富且生动的印象。要了解这种思想框架，我们不能把西方的理论硬套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而需要针对中国文化传统作深入的研究。我完全赞成她这样的方法，同时认为这应该是使“经济学”更丰富化的重要途径。

收入本书第一部分“理论篇”的几篇论文对如上新方法作了理论性的探讨，特别是《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提出“中国经济学”、“经济文化学”等概念，引人注目。以第二部分“历史篇”、第三部分“思想篇”为中心的实证性诸论文，可说是这样的方法之具体实践，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宋代，但她的眼界宽阔，涉及从先秦到现代的广大范围。

第二是对研究史的重视。作研究时当然必须把握有关研究史，但叶坦先生对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探讨不仅仅是她实证研究的前提，而且这本身就可说是一种思想史研究，亦即以二十世纪东亚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观为对象的一种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草创期的先辈学者们的“经济观”和“中国观”，无疑是东亚学术史的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认为叶坦先生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基于她肩负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责任感，因为仔细探讨一门学科的来龙去脉才是这门学科将来发展的基础。

叶坦先生广泛涉猎有关文献，其范围并不限于中国国内。尤其是她对初期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作了相当详细的介绍（比如

《日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分析》), 这使我们日本学者十分钦佩同时感到惭愧, 因为以往日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包括我)对前辈的研究注意不够, 很少有人仔细学习战前的著作。

第三是中日比较。第四部分“比较篇”的诸论文都是以中日比较为中心的研究, 其中《“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与儒学》专门分析十八世纪初日本“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像叶坦先生那样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第一流学者, 用江户时代的日文原始史料来作比较研究, 是十分难得的事, 足以窥见叶坦先生的功力。比较史研究这个东西,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很少有学者能够自由地驱使两种以上的史料语言。叶坦先生之所以得到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尊敬, 是因为她认真埋头日文史料, 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作比较史研究时, 中西比较一直是相当普遍的研究框架。“资本主义萌芽”等过去历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也可以说是以西欧历史为标准的一种比较研究。但西欧的历史不一定是历史发展的普遍标准, 我们应该通过更多样的、更柔软的比较来试图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独自性质。中日经济思想的比较对这个课题一定能够作出很大的贡献。

据我的看法, 叶坦先生的研究富有新颖的特点, 上述的三点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同时我想强调, 她的研究之“新”并不是赶时髦的、没有根底的“新”, 而是扎根于极其踏实的研究态度, 亦即中国古典的丰富知识、对研究史的重视、不辞辛劳的外文训练, 等等。最近我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 动辄忘记踏实的、辛辛苦苦的研究中的滋味, 但叶坦先生的研究常常提醒我不忘初衷。

此书出版是叶坦先生“而立”、“不惑”时代的一个总结, 同时也是新阶段的开始吧。叶坦先生“知天命”以后的研究人生如何, 我将刮目以待。在此我对叶坦先生为人和学问的一些管见略述如上, 以代序。

2004年9月于东京大学

自序

叶坦文集

国人好像都很在乎“本命年”，有的说这一年好，会有好事；也有的说这一年可得注意，要系“红腰带”避邪。不管怎么说，再过些日子就是我四十八岁“本命年”的生日了，真不敢相信！书斋生涯，让我常常忘记了岁月，忘记了年轮，似乎只有冬夏，不觉春秋。

其实此刻的我并未咀嚼出“人生短暂”的无奈，甚至也没有一种学者要出书尤其是自己的文集应有的激动；心，真的很平静，跳动的节奏与钟表的“嘀嗒”之声和谐不紊，这是不是所谓的“平常心”呢？屈指算来，自己先后也出了二十多本书，包括合作的，也包括译著，这不过是专业学者的“天职”，但出文集则还是头一次。这无疑是件大事，特别是时值人生四十八岁，要算是生命的记铭。挚友岸本美绪应允为此写序，这又勾起我的“犯懒”，想把写“序”的负担都推给这位与我有着十几年友情的中国学家，因为东京大学岸本教授的道德学养和严谨谦和在国际学界都是颇为著名的。可又想想，无论如何本人也该有个交代，无论对读者还是对自己，于是往下写——

我的专业是中国经济思想史，1985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巫宝三先生的博士生，一晃就快二十年了……那时候，刚从武汉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将到北大工作的我，得到素昧平生的巫老亲切鼓励而报

考。他多次谈到，相对于经济理论来说，文史基础更为艰深，在我之前他一直没有招博士生。那时不像现在，博士学位获得者比较少，就拿“显学”经济各科来说，迄1988年我国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者仅六十五人，而中国经济思想史唯独在中国内地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直到这一年才首次授予博士学位，获得者是北京大学的张鸿翼和社科院的我。有关本学科的学理特征、独有优势以及科研教育情况等，在与此文集同时出版的专著《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以经济思想为中心》中有详细论述。应当说，在后来的时光中我能够始终“甘坐冷板凳”坚守学科阵地，与上述经历也是分不开的。2005年恰值先师巫老百年诞辰纪念，此文集亦是对先生的告慰！

治中国经济思想史，对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的要求都比较高。抛开学术“大男子主义”不论，即使对女学者并不歧视的人，一般也认为女性在文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学科中容易成功，而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则很难，这或许有一定道理，本人却不敢苟同。我认为，性别虽有差异但不是主要的，关键是都要有意磨砺并注意“补短”，有道是“天道酬勤”，但勤奋只是治学的前提，而理论素养的蕴积和研究方法的新探则是学问创新之根本，这也是二十多年来自己从学与科研经验的总结。治学不同于讲课，后者主要是知识传授与思维启迪，前者则重在求实创新：或资料的新发现，或材料的新诠释，或成论的新修正，或内容的新拓展，或科研的新方法，或理论的新探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大抵如此。

自硕士生时代起，我就比较自觉地注重加强理论方法的学习摸索，这与本科在河北大学历史系受到宋史专家漆侠先生的影响有关。然而，理论方法也要求因事、因时而“具体应用”或“与时俱进”，教条、僵化或照搬绝不可取。而在珞珈山那小径紫藤的追忆中，更多的是当年周大璞、阙勋吾、尹进等不同学科导师的循循善诱和校方难得的兼容大度，使我这个中文系的研究生得以兼修哲学、经济、历史、图书馆等学科课程，打下了从事科研的基础。来到巫老门下，我开始受到严格的经济学训练，深切感受到这位哈佛博士的风范，本书收录的《“不惑”人生》谈得详细一些。更为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

明白了——理论是工具，而不是思维禁锢或既定答案，科研也不是为已有结论找证据作注释。这太重要了！于是，我摸到了“学问”的门框。直至今天，对二十年来交往最多的吴承明先生“史无定法”之说的领悟，离不开上述思维理路之逐步演进。近日八旬有七的吴老还为拙著《经济学术史》写下序言。这些年来，我并没有离开史学的求教，王曾瑜先生治史的深厚功力与愤世嫉俗的风骨以及细微亲切的关怀，都是对我不断的鞭策。

我正式发表论文最早是在1981年春，当时二十四岁，是本科三年级，发文两篇，一是关于隋代经济的，再一是有关先秦学术的。或许是偶然，经济与儒学的探究就这样开始了。至今恰巧又是二十四个年头，我迄今人生旅程的一半。我从这二十四年来已发表的一百三十余篇中外文论文中选出中文作品三十篇，为保存原文风貌，仅作了出版要求的注释统一调整和必要的字句修正。由于是独立发表的论文集成，个别内容难免重复，不同刊物的版式要求等也有不同，原有内容提要均不再刊出。原文先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及港台学术刊物上，其中多篇被转载、引用，还有的获奖。这里如实记录着我从学和科研的足迹，每篇文章力求有新意，或首次研讨，或提出新论，或修正成说，尽管今天看来有的可能幼稚粗陋，却是自己脚踏实地的求索历程。选文围绕“儒学与经济”的主题，这既是我二十多年来跨学科科研的核心，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理特质的集合，占据学科很大比重的传统时代中儒学居于文化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本书作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专著的姊妹篇，正如吴老在其序言中所指出的，专著中许多内容都是长期治学的积累。的确，文集是专著的基础和前期研究，专著中的许多思想观点以及“问题意识”在文集中都依稀可辨；一些论文中提出的问题，到专著里得到深入拓展，而且有些论文本来就是相关课题的成果。学术创新必以深厚的理论探索和以往研究的分析总结为基础，这也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文集分为理论、历史、思想、比较和现实五篇——

“理论篇”选文六篇，主要集中了自己在经济文化与学术史方面的理论探索，有二十世纪末期对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的研究和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的探讨，从语义阐释等角度对“中国经济学”的“寻根”考证，以及依据出土的郭店楚简对道家与儒家的基本范畴“无为”提出的新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立足中外经济学说史比较研究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这一根本性大问题，并首次对中国经济学术史进行重点考察。这些研究在材料、观点、理论、方法诸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创新尝试，也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历史篇”七文，主要集中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宋代的研究。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体制转化、工商业及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特征，运用新史料反驳司马光保守不变的传统定论；通过评论宋神宗的改革理想与实践，对以往“王安石变法”提出质疑。此外，首次从经济思想视角研究宋代“钱荒”，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从法律史视野考察宋代的印刷事业与版权保护，肯定中国人很早就有版权保护意识并施行“盗印法”等相应的措施。宋代特殊的时代特征决定其成为科研的基点，研究中若干论点均系发前人所未发。

“思想篇”八篇论文，均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宋代。比较司马光与王安石经济思想之异同，立足于宋代考察中国商品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化，特别是论析世界货币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宋代纸币理论，将帝王的经济观纳入经济思想史研究，并作为朝廷经济意志的集中体现。对两宋时期的经济理论的考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分量很重，而专题研究宋代“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则改写了一般认为其到明清才出现的记录。从经济范畴史角度对亘贯几千年的“利”概念进行综合考证分析，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深化；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则赋予“实学”新的时代内容与理论诠释。这些新探索多产生了较大影响。

“比较篇”四篇，集中于中日比较，这是我们在世界上最先倡导开展东亚主要是中日经济思想研究的实证考察。从基础性的中日文化深层结构比较出发，略论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之基础与同异，分析日

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深入研究日本“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与儒学的关系，均为新开拓的科研内容。由于论文主要在海外发表，反响较大。

“现实篇”也是四文，治史不可不知今，其重心仍是经济文化，主要探索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对行政区划“结合部”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初探，总结分析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考察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关系，并就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学问题进行现状与学理的思考。这些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终篇”《“不惑”人生》是自己对求学之路与人生选择的真切心声。

写到这里，我仿佛看到自己治学的蜿蜒足迹汇聚而成的上述五个篇章，像是环嵌在“儒学与经济”花心的五片花瓣，尽管不在同一平面且色彩纷呈，却鲜活地勾绘出我学术之花的基本轮廓：理论为先导，历史即根基，思想系主体，比较成拱卫，现实是落点。这花、这卉根植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沃土里；这土、这人静静地存活在“显学”的边缘；这份安详，这份自得，绝非名利权贵能够领略。其实，老子早说了，福祸相依——这大概也就是自己快要“知”的“天命”？

其实，心无旁顾必有所成，“边缘也出彩”！细心的读者定能从阅读中发现一门颇具特色而很有前景的优势学科，我也因之无论面对鲜花微笑，还是跻身荆棘丛中，都不敢有一刻懈怠。青春年华伴随青灯冷砚在无怨无悔中流逝，留下的是这些文字——幼稚的、激越的、探索的、沉思的……

甲申仲夏于北京

目 录

序	(1)
自序	(4)

理论篇

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	(2)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	(14)
“中国经济学”寻根	(24)
儒家“无为”说	(44)
论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	(55)
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	(80)

历史篇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体制转化	(100)
略论司马光的守常与变通	(111)
评宋神宗的改革理想与实践	(114)
论宋代“钱荒”	(126)
宋代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特征	(144)
宋代的印刷事业与版权保护	(158)
宋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征	(171)

思想篇

司马光与王安石经济思想异同论	(194)
商品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化	(214)
宋代纸币理论考察	(237)

宋代帝王的经济观.....	(259)
两宋时期的经济理论考察.....	(268)
“为富人辩护思想”解析	(277)
论“利”	(285)
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	(303)

比较篇

中日文化深层结构比较.....	(332)
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略论.....	(355)
日本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分析.....	(377)
“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与儒学	(392)

现实篇

“结合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初探	(420)
论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	(427)
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	(445)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学.....	(461)

终 篇

“不惑”人生	(476)
跋.....	(501)

致谢

感谢我的恩师——王德昭先生。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思考，对我影响至深。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给了我支持和鼓励，让我能够安心地完成学业。感谢我的朋友，是你们的陪伴和支持，让我的生活充满了乐趣。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生命中的宝贵财富。



《理 论 篇》是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三十日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飞跃。

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

一

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无疑是以为经济水准作为基础的。然而，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系统，社会发展是个大的系统工程，各子系统以及各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制约，无不对基础起作用。因此，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应当重视非经济诸因素的作用问题。

马克思主义肯定经济的基础作用，同时认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①。列宁明确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②。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其思想意识、行为模式、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等，直接指导和制约着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的现代化是个中心环节。

人的现代化，主要是人的意识观念的现代化，这是支配人的行为方式的核心。经济观念是指导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思想意识，是国民意识深层结构的基础，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的基因。经济思想与观念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中介。思想观念本属上层建筑范畴，却唯有经济思想与观念，是人类经济活动最直接、最能动的反映，并反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页。

过来直接而具体地指导人类的经济行为（包括政策制定到实际操作的全部过程）。人类自有经济活动便会有经济思想产生（当初是以非自觉的、零星的、片面的、粗糙的形式出现的），但是，经济观念则带有一定的系统性、逻辑性和时间性特征，以其理性思辨和非理性习俗的形式，规定和制约着人的经济活动，观念是思想的凝聚与升华。

众所周知，中国不曾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几千年来逐步形成的传统经济观念对现代社会依然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国民意识的深层结构，是进行改革与深化改革的要点之一。认真反思、解析、扬弃与批判继承传统经济观念，是当今的现代化建设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以往的现代化口号中没有着重提及人的现代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无论从理论上抑或实践中看，都将证实这一点^①。

我国学术界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而不断变化。但是，从经济、哲学、历史、文化等综合视角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考察还很不够，而立足于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认为是难度较大并且尚在起步的探索。这一探索希望以经济文化学的理论体系为基础，剖析国民意识深层结构的基础——经济观念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作用，为深化改革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借鉴与提示。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以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体系为典型，已经阐释了“人类的本性”即人们追求利益的天性是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因。换言之，人的心理、意识等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已为经济学家所认识。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不是源于社会制度，而是在于人们的心理因素等，如人们爱财而存钱，对货币灵活性有偏好

^① 参见拙文：《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发展——现代化主体简论》，载1989年7月17日《理论信息报》。